

青年恩格斯的新闻活动和新闻传播思想

——恩格斯为德国科塔出版社报纸撰稿的历史

陈力丹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实践的历史上,青年恩格斯的新闻活动应该是一段不能或缺、充满实践与思想活力的开篇。文章根据最新的材料论证了恩格斯20岁前后为德国最大的科塔出版社出版的日报《知识界晨报》《总汇报》撰稿的情形,梳理了他当时的新闻专业理念。文章有以下的发现:其一,恩格斯通过数次报道蒸汽轮船用于欧美交通而表达了他最早关于传播的时空观;通过报道低地德语的流通而表达了他最早关于传播与语言关系的思想。其二,恩格斯自觉遵循了当时商业性新闻工作不偏不倚的工作惯例。他为属于文学派别的《德意志电讯》撰稿,一旦道不同,没有了共同语言,便停止为它撰稿。为商业性的科塔出版社的报纸撰稿,虽然那时报道中可以夹杂作者的观点表达,但习惯于平衡地再现与他对立的观点,给读者留下报道者不偏不倚的公正印象。其三,恩格斯那时已经具有鲜明的新闻价值意识。为市民报纸《知识界晨报》撰稿,他明显有关于娱乐、文化、知识方面的考虑,但为全国性大报《总汇报》的撰稿,他衡量事实的唯一标尺是新闻价值要素,因而他发表的新闻几乎篇篇有社会影响。其四,恩格斯具有强烈的新闻时效观念。恩格斯所在的城市不来梅位于德国西北部平原,而科塔出版社的报纸编辑部位于西南部高原,交通工具主要是马车,因而那时的新闻时效以月、旬作为衡量单位,而恩格斯已经以“天”为时间单位了。

关键词:青年恩格斯;总汇报;知识界晨报;新闻价值;新闻时效;传播时空观

中图分类号: G2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443(2018)01-0005-11

项目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182)

1982年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青年恩格斯论著卷)出版之前,中国新闻学界对青年恩格斯的新闻活动几乎一无所知。而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实践的历史上,这应该是一段不能或缺、充满实践与思想活力的开篇。随着2005年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2版(从德文直接翻译、收录全面的青年恩格斯论著卷)的出版,以及2015年《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33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平与事业研究Ⅲ)的出版,使得考证这段历史有了较为丰富、准确的材料。

一、青年恩格斯从事新闻工作的起点

1837年9月,恩格斯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被父亲安排在巴门(恩格斯的出生地)自家的公司里实习;1838年7月,又被父亲派到不来梅,在他的朋友、萨克森王国驻不来梅领事亨利希·洛伊波尔德(Heinrich Leupold)开办的国际商行做实习生。不来梅处于德国威悉河河口,是德国通往世界各地的重要贸易港口城市。青年恩格斯失去了读书机会,却意外地获得了观察世界的开阔视野,在文学评论与新闻发表两方面获得了充分的发展空间,随后他在柏林服兵役一年,到柏林大学做旁听生,又在哲学方面获得长足发展。他阅读各方面的报刊和文学、哲学、宗教著作,如饥似渴地汲取精神营养,思想成长十分迅速。

1838年9月,不到18岁的恩格斯在《不来梅杂谈》杂志发表了他的处女作《贝都英人》。这是一首诗,极为细致而富有情感地描写了他在不来梅看到的来自北非沙漠贝都英卖艺人的表演。他善于观察和表达的特长初露峥嵘。

1838年12月,为迎接古登堡印刷术诞生400周年的纪念活动,德国布伦瑞克的出版商亨·迈尔(Heinr Meyer)计划出版一本《古登堡纪念册》(Gutenbergs-Album),向全国征稿。恩格斯积极响应,于1839年1月意译、改写了西班牙诗人曼·金塔纳1800年写的诗《咏印刷术的发明》。18岁的恩格斯的作品被迈尔选中,收入这本八开本的豪华纪念册。该书收入迈尔写的古登堡生平和印刷史、58位德国作者的纪念文章、62篇使用46种其他文字撰写的赞美古登堡的诗文和对应翻译(恩格斯的作品为62篇之一)。1840年该书出版,在众多纪念古登堡的出版物中独占鳌头,为此古登堡国王授予迈尔科学与艺术奖章。恩格斯改写的译作,表达了他对印刷术推动传播业发展的深刻认识:

如果没有你,
时间会一再吞噬自己的生命,
成为僵尸葬入永被遗忘的坟茔。
人类的思想在漫长的童年时代曾受限制,
而你一旦降临,
思想便冲破藩篱,迅速走向开阔的佳境。
它向遥远的世界展翅飞行……
让一条真理激起千千万万回声,
让山鸣谷应的巨响把真理宣告,
让真理鼓起清晰的双翼,飞向云霄!

恩格斯对印刷术引发的巨大传播力及其走向,给予了高度评价,包括科学的传播,更有自由思想的传播。他认为,古登堡的革命作用在于他实际上向全世界高呼:“人是自由的!”并借助他的发明让它震撼四方,响遏行云。^[1]

恩格斯从1838年8月赴不来梅做实习生,到1842年11月在柏林服兵役后经故乡巴门去英国曼彻斯特欧文-恩格斯公司实习,4年里他(时年18-22岁)交替为10家报刊、2本文集撰稿,还单独出版了2本哲学小册子和1本长篇讽刺诗。还有一部没有发表的剧本以及若干诗作。如此丰富的文字活动,需要分头来研究。

二、恩格斯与科塔出版社报纸的关系

恩格斯的文学评论及其文学思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他发表于“青年德意志”文学派别的周刊《德意志电讯》的系列文章里(见本期笔者与邹霞合作的《恩格斯与文学期刊〈德意志电讯〉》);而他关于新闻的认识,则体现在他为德国(当时是松散的“德意志联邦”)最大的出版社科塔出版社(Verlag Klett-Cotta)出版的三种报纸撰写的系列新闻里。这三家报纸是:《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在奥格斯堡出版)、《知识界晨报》(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在斯图加特出版)以及附属该报的晚报《知识界午夜报》(Mitternachtzeitung für gebildete Leser)。

科塔出版社18世纪末由约翰·弗里德里希·冯·科塔(Johann Friedrich von Cotta)创办,19世纪上半叶成为德国最大的出版公司,除了出版图书,还拥有德国最大的报纸《总汇报》,以及一批市民化的报纸、专业性的报纸杂志。德国是现代报刊业的滥觞,恩格斯的家乡巴门镇和临近的埃尔伯费尔德镇,都有办得不错的日报(现在巴门、埃尔伯费尔德和附近的几个镇已经连成一片,形成一个中等城市——伍佩塔尔)。1832年,科塔家族第二代约翰·格奥尔格·冯·科塔(Johann Georg von Cotta)接手出版社。

恩格斯1840年3月和5月在《知识界午夜报》分9次连载,发表1组2篇文学述评;1840年7月至1841年8月在《知识界晨报》发表4组共12篇报道和1首置于报纸头版头条的与新闻相关的诗;1840年8月至1841年2月在《总汇报》上发表5组(篇)共8篇报道。多数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Friedrich Oswald),或这个署名的缩写,也有匿名发表的。

《总汇报》的工作程序严谨,科塔出版社的档案里至今保存着《学者通讯登记簿》《稿酬登记簿》和报纸的出版样本,留下了恩格斯为报纸撰稿的记录,以及编辑修改的笔迹、署名删除和标明的笔迹。这些都是

研究恩格斯早期新闻实践和思想的珍贵的实证材料。

载于《知识界午夜报》的恩格斯的文学述评《现代文学生活》，中译文2万多字。为写这篇文章，恩格斯在1839年做了大量的材料搜集工作。文章提及的文学报纸和期刊多达9种，涉及当时德国文学“青年德意志”派的几十位作家和他们的几十部作品，时效性就当时而言，颇为新潮。但该报毕竟属于文学小圈子，对社会的影响有限。



图1 格奥尔格·科塔



图2 1840年8月20日恩格斯的自画像

青年恩格斯在对文学评论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也对新闻写作发生了兴趣。于是，经接近“青年德意志”的作家和报纸编辑许金(Levin Schücking)的介绍，恩格斯1840年7月给新闻性的全德市民报纸《知识界晨报》编辑海尔曼·豪夫写了一封自荐信并附上了第一组新闻稿。没想到回复他的是该报的顶头上司——老板格奥尔格·科塔。科塔写道：“阁下从您所在的城市给晨报编辑部寄来了一些通讯报道，想必您已在这一期看到了这些报道文章，我为约·格·科塔出版社的报刊寻觅一位通讯员的时间越长，越是徒劳无益，我对这些报道的感激之情就越深。”他还直接建议恩格斯为出版社的主要报纸《总汇报》撰稿，写道：“正如我没有想成功地为其余的科塔报刊找到通讯员一样，我也不可能为《总汇报》在不来梅找一位通讯员。因此，我冒昧地询问您是否答应不时从来梅给奥格斯堡的《总汇报》寄些通讯报道。您可能十分熟悉该报的精神和目的，所以我无须给所提到的报道的内容作任何指示……”^[2]恩格斯接受了这个建议，1840年8月给《总汇报》编辑古斯塔夫·科尔布(Gustav Kolb)发出了第一组新闻稿。

而对于科塔来说，这是他敏锐的新闻职业意识和报刊经营意识的表现：发现适合的新闻通讯员就要抓住不放；不失时机地扩大自己的报道面。当时《总汇报》的发行量为1万份，在欧洲是仅次于《泰晤士报》的大报，以致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称该报为“欧洲的总汇报”，^[3]恩格斯在1844年称该报为“德国的《泰晤士报》”。^[4]《知识界晨报》的发行量为1800份，这在地方报纸多如牛毛、国家分裂为30多个邦国的德意志联邦，能够跨邦国在各邦大城市发行，适应市民们的共同兴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三、为全德市民报纸《知识界晨报》撰稿

不来梅是德意志联邦的四大自由市(相当于独立邦国)之一，作为世界贸易港口城市，享有较高度自治权，政治开明，自由主义思想通过报刊和书籍得到广泛传播。1840年7月30日和31日，《知识界晨报》发表了恩格斯为该报写的第一组不来梅通讯(共3篇)，集中展现了177年前不来梅市的文化、出版、新闻业的繁荣状况。在新闻传播史研究方面，恩格斯提供了一手的观察资料，得以使人们具象考察19世纪30-40年代德国公共领域的形成、大众化报刊的萌芽及书报审查的情况。依照发表时间，恩格斯的这组专门叙述出版、剧院、报刊的不来梅通讯，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早的历史文献。那时青年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正在形成中。

这组稿子的第一篇标题为《剧院》，他的第一句话是：“据我所知，没有一家著名杂志在不来梅有常住通讯员。”^[5]显然，就这个城市的对外报道而言，恩格斯所做的事情具有开创性。他选择的主题是自己最为熟悉

的文学艺术,报道和评论了不来梅剧院新近演出的两部剧目《查理·萨维奇》和《时髦的狂热》。由于恩格斯观看了演出,因而他叙述的真实性毋庸置疑,既显现了他对作品和作者的熟悉,又显现了当时正在形成中的新闻不偏不倚的惯例。他关于剧目和作者的叙述均为两面说,同时也成功地把自已的意见糅入报道中。

同一期发表的恩格斯的第二篇文章的标题为《出版节》,叙述了不来梅印刷工人庆祝古登堡节的盛况。为庆祝这个节日,印刷工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从知名人士在大礼堂发表演说,到委员会带领全体印刷工人举行盛大游戏;从整个威悉河口的所有船只桅樯竖起各种彩色旗帜,到巨大的凯旋门和整天礼炮的鸣响;从新建的“古登堡”号轮船飘扬的花环与旗帜,到轮船溯流而上抵达兰凯瑙公园……印刷工人们一路演唱赞美诗、发表演说,沿途桥上和码头上许许多多的人在欢呼。不来梅港造船厂厂主、德国第一艘轮船(1816年)的建造者约翰·朗格(Johann Lange)提供了早餐、午餐;晚上,人们在音乐和灿烂的灯光中畅饮啤酒和香槟……恩格斯翔实地描述了不来梅古登堡节的热闹场面,他强调“庆典具有了全民节日的性质”。^[1]不用说,恩格斯参与了节日的全过程。没有目睹,不可能把节日叙写得如此栩栩如生。

第三篇《刊物》,记叙了不来梅的主要报刊和市民的读报活动。恩格斯写道:“人们参加读书会,部分是为了赶时髦,部分是为了有一本杂志在手能舒舒服服地度过炎热的中午。然而,只有丑闻和报上一切关于不来梅的消息才能引起兴趣。多数有教养者的这种冷漠态度,当然是由于没有闲暇,特别是商人不得不经常考虑自己的事务”。^[2]这一从现在看似不起眼的东西,当时具有重大意义。根据历史资料,1770—1820年间,有597个读书(报)会在德国成立,读书会的成员近6万。不来梅拥有读书会36个,比重相当高。这些读书会的成员少则数十人,多则几百人。读书会为成员提供小说、定期出版的文学杂志,以及一些非小说类的读物,一些读书会为会员提供免费的外国报纸阅读。^[3]这即是尤尔根·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在德国的表现。恩格斯特别谈到了商人阶层对读书会的兴趣所在,以及他们与一般人不同的信息选择。

当时的德国没有统一,报刊的地方主义色彩比较浓重,每一个城镇都有自己的日报和期刊。恩格斯描绘了不来梅地方报刊,写道:“这里有一种自成一体的读物;其中有些以小册子(其内容多数与神学争论有关),有些以期刊的形式大量销售。消息灵通、编辑得体的《不来梅报》在广大读者中享有盛誉。”^[4]从恩格斯的论述看,当时不来梅商业化的市民报刊已经初具规模,一些书商看到了报刊业潜在的巨大商业利润,因而愿意在这方面投资。

不过,普通读者感兴趣的是各种本地的社会新闻。恩格斯提到的《不来梅杂谈报》正是这样一份报纸,他写道:“丑闻、演员之间的不和、街谈巷议的飞短流长等等充斥版面的地方小报倒可以自夸其经久不衰。”^[5]该报每天关注着不来梅当地发生的事情,例如剧院座椅上的钉子、商会没人买的小册子、喝醉酒的雪茄烟工人、没打扫干净的排水沟,都是它报道的焦点。恩格斯更看重这家报纸大胆地批评各种滥用职权的行为,“如果国民近卫军的军官认为自己大权在握,可以在人行道上骑马,那么他可以确信,在该报的下一号将会提出一个问题:国民近卫军的军官是否有权在人行道上骑马。这家优秀的报纸可以成为不来梅的上帝。”^[6]

恩格斯还记述了当时的书报审查:“不同于这些报刊的是一家宣传虔诚主义-禁欲主义的杂志——《不来梅教会信使》,它是由3个传教士编辑的,著名的寓言作家克鲁马赫尔偶尔也为该杂志撰稿。这家杂志办得十分活跃,以至检查机关不得不时常进行干预。”^[7]他的记述证实了即使在自由市不来梅,也存在书报检查,但因为地方性的报刊内容大多不涉及政治,所以报刊与书报检查制度的斗争在这里似乎不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矛盾现象。另外,由于德国不统一,各邦国实施书报检查的尺度差别很大,不来梅的书报检查是很宽松的,故恩格斯可以涉猎德国内外各种报刊,自由地发表意见。不来梅作为世界贸易的港口城市,是外国报刊的集散地,恩格斯也充分利用这些报刊来扩大眼界。

这三篇新闻报道,也为了解1840年德国报刊与社会变迁,提供了目睹的一手观察材料。恩格斯的观察证明:德国的商业中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了茶会、商会、读书会等各类公民组织,新兴资产阶级的公共活动空间逐渐扩大,德国公共领域初步形成。那时德国报业已处于大众化报刊的前期。虽然德国整体尚未完成工业化,存在着报刊检查制度,但审查制度的宽严差距很大,恩格斯生活的不来梅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各种外国报刊都可以看到。正是在不来梅的这段时间,给了恩格斯博览群报、开阔眼界的绝好

机会,他积极为各报刊投稿,留意了不来梅的文化、出版、报刊业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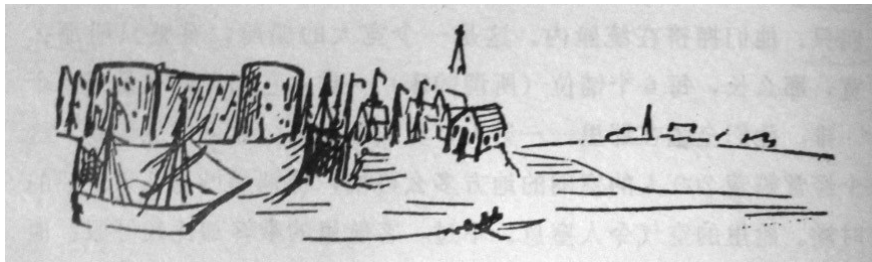


图3 1840年7月7日恩格斯的“不来梅港素描”

恩格斯为《知识界晨报》第二次投稿的内容是一篇游记《不来梅港纪行》,写于1840年7月,中译文6000多字。报纸编辑部把文章拖了整整一年,1841年8月分5次连载,仍然注明“7月于不来梅”,给读者的感觉是新近的事实。这篇报道是恩格斯1840年7月5日乘坐“罗兰”号轮船从不来梅市区到威悉河出海口的不来梅港一日游的观光通讯,除了对美丽的沿途风光、大海壮丽景色的描写外,他通过观察轮船上各类人群、观察不来梅港停泊的两艘来往于德国-北美轮船上赴北美的乘客,再现了当时德国下层人民的生活与精神状态,显现出他对人民痛苦的深切同情。

不来梅港的船只进出频繁,当时恩格斯恰遇到几艘来往于德国-北美的船只,德国成批的下层民众背井离乡涌向北美新大陆,试图开辟新生路,当时每年达到1万~1.4万人。他写道:“当船舷上站满旅客的船只缓缓地由港湾向停泊场开去并且从那里扬帆出海时,我看出他们的心情是沉重的。他们差不多全是德国人,有着诚实开朗而毫不虚伪的面孔、坚强有力的双手。……驱使他们前往的是德国农民处于农奴依附地位和独立地位之间的不稳定境况,是世世代代的屈从以及世袭法庭的专横暴戾。”恩格斯进港参观了一艘大型三桅船,船的上层是高等级舱位,小巧舒适,极为优雅,那是为来往于欧美间的商人准备的。当恩格斯和其他参观者往下走进统舱的时候,他写道:“‘可是,那底下是可怕的’。^①整个统舱放满了铺位,一张紧挨着一张,而且都是双层床。男人、妇女和小孩,像马路上的石块一样并排躺着,病人挨着健康的人,空气窒闷。每动一步都会碰上一堆堆衣服、家用杂物之类的东西。这里小孩哭,那边有人从铺上抬起头。一片悲惨的景象!”这些人都来自德意志联邦的萨克森王国。恩格斯说:“坐统舱的全是贫民,他们付不起90塔勒的舱位费;还有一群人,在他们面前人们是不脱帽的,有人说他们举止粗鲁,有人说他们没有教养。另外就是平民,他们一无所有,却是一个国王在自己的国家中所能拥有的精华。”^②

在这篇通讯里,可以发现1844年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恩格斯写作考察曼彻斯特和伦敦贫民窟的著作(类似现在的深度报道)《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情境、情感和写作风格的来源。

这篇文章里恩格斯还提到《远洋运输和贸易报》(英国报纸)等数家德国和外国经济信息报纸,他写道:“当不来梅港要塞呈现在我们眼前时,我所熟悉的一位书商吟咏了席勒的诗句,那位海上保险公司经纪人在阅读《远洋运输和贸易报》,有一个商人在翻阅最近一期的《进口通报》。”恩格斯自己“拿起放在桌上的报刊,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不来梅商业年报》”。^③他发现报纸关于商情的行文竟然使用了现代美文学和哲学的表达方式,不禁与一位不来梅大船主的雇员讨论起来。显然,阅读各类商业报刊已经成为不来梅商人获取商业信息的一个重要手段。

恩格斯为《知识界晨报》第三次投稿写的是一首新闻诗,这是他为1840年8月25日逝世的德国作家和戏剧评论家卡尔·伊默曼(Karl Immermann)而写,在一周内完成。伊默曼是将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精神带到德国的代表性作家,恩格斯对他评价很高。《晨报》也有新闻意识,将这首诗不惜篇幅地安排在头版发表,全诗9节共74行。1841年斯图加特出版的诗歌集《时代之歌》,收入了恩格斯的这首诗。可见,新闻诗若处于一定的时效内,其影响力还是颇大的。

恩格斯为《晨报》第四次投稿写的是一组4篇新闻报道。第一篇《理性主义和虔诚主义》,他开篇就从

^①引自席勒《潜水者》——原书编者注。

新闻价值角度交代了为什么做这一报道：“终于有了一份不属于茶会上闲聊范围的材料，它使我们自由市的全体公众都感到激动，以致每个人都表示了赞成或反对，它也值得严肃的人去思考。”^[1]此文较为详尽地报道了不来梅教会两派的争论，对双方均有批评，基本摆平。随后其中的理性主义代表卡尔·帕尼埃尔连续给编辑部写匿名信，不能接受恩格斯对他的批评（其实恩格斯对虔诚主义的批评还要多些）并要求立即答复。报纸编辑部发表了一篇理性主义的文章，但拒绝了帕尼埃尔的要求，也没有发表恩格斯为此写的反驳帕尼埃尔的《声明》。

这组稿子的第二篇报道《航运规划》，叙述了一位年轻的不来梅商人、螺旋桨股份公司创办人卡尔·科伊特根(Karl Keutgen)改进轮船技术的规划。如果成功，从美国到德国的航行时间就可以从23天缩短到11~18天。恩格斯从交通革命的角度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第三篇报道《剧院》，叙述德国演员卡尔·宰德尔曼(Karl Seydelmann)到不来梅的巡回演出，评价了他“遐迩闻名的演技”。^[2]第四篇的标题是《军事演习》。1840年9月12-20日德意志联邦第八军团在不来梅附近举行野外演习。恩格斯生动地叙述了成群结队的不来梅人如何把演习地点当作了观看的娱乐场所。

恩格斯最后一次给《知识界晨报》投稿是在1840年底，第二年3月底他结束在不来梅的实习回到巴门。这组不来梅通讯共4篇报道。第一篇《教会论争》是对上次报道《理性主义和虔诚主义》的继续。几个月后，不来梅教会两派的无聊争论开始回落，恩格斯的评价是：“一场咬文嚼字的游戏”。^[3]第二篇《和文学的关系》(栏目叫“不来梅通讯”，因而省掉了主语“不来梅”)，报道了不来梅文学再度繁荣的种种迹象。不来梅与其他原汉撒同盟(13-17世纪波罗的海南岸沿海城市的商业-政治联盟)城市相比，其文学底蕴还是比较厚重的。第三篇《音乐》，报道了不来梅文学兴起中最好的一个侧面——音乐。“音乐会总是座无虚席。而且，一种良好的音乐鉴赏力几乎是完好地保存下来了”。^[4]

这组文章的最后一篇是《低地德语》，特别介绍了不来梅流通的方言。德国北部是莱茵河平原，南部是巴伐利亚高原，故有低地和高地语言的差异。恩格斯那时已经熟悉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丹麦语，以及各种德国方言，对语言很有研究。他报道的第一句话就把人们引导到对不来梅语言的观察：“外地人来到这里首先注意到的是，甚至连最有名望的家庭也使用低地德语。不来梅人只要一谈知心的、不见外的话就开始使用低地德语。”他分析了诸多与不来梅方言相关的语言现象，得出颇有语言学家风范的建议：“参照威悉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土语来制定不来梅方言的语法，将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5]

四、为德国最大的综合性报纸《总汇报》撰稿

恩格斯投给《知识界晨报》的稿件与投给《总汇报》的稿件有明显差异，因为他十分清楚两报的不同性质。前者的主要读者是德意志各邦国大城市的市民，因而报道的内容大多属于社会新闻——剧院、文学、出版节、报刊、音乐、旅游、宗教纷争、轮船加速、观看军事演习、方言等等。而后者主要读者是国内外的社会活动家，影响力远大于前者。他为该报投去的8篇新闻都很短，但大多属于相对宏观的政治-经济新闻。

1840年8月20日《总汇报》发表了恩格斯撰写的第一组报道(两篇)，第一篇是不来梅《与关税同盟签订的通商条约》，这是一条重要的经济新闻，报道了签约后不来梅市政府、不来梅各行业商人的意见，分析了各类商品在签约后流通的得失。第二篇《不来梅在同盟军队中的兵额》，这是一条政治兼经济新闻，报道了不来梅兵役制度的改革，而改革的结果是要向没有服兵役的16-26岁男青年征收军税。第一条新闻对欧洲经济的发展走势会带来影响；第二条对德意志联邦军队向各邦国征兵会带来可能的连锁反应。此文9天后被《军事总汇报》转载。

他投给《总汇报》的第二组稿件(两篇)是关于英国蒸汽机动力螺旋桨轮船的介绍，以及这一新技术在



图4 载有恩格斯第一组报道的1840年8月20日《总汇报》头版

此文9天后被《军事总汇报》转载。

德国与美国间航运中的应用。恩格斯写这组新闻之前,德国的航运业主要依赖小型木制帆船,几乎无人将蒸汽机应用于航海船只上;德国报刊关于英国螺旋桨轮船,只有短小的零星报道。恩格斯的这组文章在德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被很多专业杂志转载。

这组报道的第一篇后半部,翻译了英国《格拉斯哥阿尔古斯报》和《爱丁堡晚邮报》关于英国“阿基米德”号螺旋桨轮船技术的详尽描述和评论。这两家苏格兰的报纸并非著名大报,前者是当年创刊的周二刊报纸,后者是当年停刊的周报,能被恩格斯发现并大段摘引翻译,显示出时年不到20岁的恩格斯广泛的阅读视野和熟练的英文水平。

第二篇报道描述了“阿基米德”号围绕大不列颠岛的1700英里环岛航行以及赴法国、比利时、荷兰的试航,再现了当时人们对此发明的欢呼雀跃之情。发明者弗兰西斯·斯密斯爵士(Francis Smith Sir)被授予爱丁堡艺术和手工业协会的科学嘉奖。恩格斯还报道:“海军上将爱德华·科德林顿爵士参加了航行表演,他怀着真诚赞扬的心情,要海军主管部门注意这项发明。”^[1]恩格斯提请不来梅第一流的造船专家和富有的航运企业支持在不来梅建造螺旋桨轮船的计划,他写道:“不是预言家,也能预言:即使这一事业由于船主们的忌妒而遭到破坏,不来梅与北美之间的轮船交通也会很快开辟,不过那时将由某个北美城市来开辟……英国或美国就会经营这一项业务,德国不仅得不到好处,而且还会被认为是因图小利而不能谋大业的国家。”^[2]由于无人响应前面恩格斯提及的不来梅商人卡尔·科伊特根改进轮船技术的规划,恩格斯的预言在1847年应验了:纽约“远洋轮船公司”开辟了不来梅与纽约之间的螺旋桨轮船航线。

恩格斯投给《总汇报》的第三组稿件再次引发轰动。这是一组两篇报道。第一篇中译文连电头仅100字,标题为《为法国军队运送马匹》。当时普鲁士与法国之间关系紧张,德意志各邦追随普鲁士而禁止军用马匹运往法国,这条报道证实有一批军用马匹在汉诺威王国境内第一个驿站被截。第二篇的标题为《手工业者联合会》,涉及的内容颇为敏感。1840年夏天法国密谋性组织“四季社”发动巴黎工人大罢工,于是德国报刊关于本国各地的工人社团活动多起来,担心也会发生同类事件,不来梅的泥瓦匠骚动便是一例。恩格斯及时对此做了报道,说明不来梅工人活动背后有“阴谋”是夸大其词。恩格斯的这组报道被3家较有名气的德国日报和法国的《工场》月刊转载。

恩格斯第四次为《总汇报》写的是一篇关于英国螺旋桨轮船消息的连续报道《不来梅港同纽约的轮船航运》。文章开篇就很吸引人:“我很高兴向你们报道,为不来梅同纽约之间的定期航线建造一艘排水量为1000吨级轮船的决定,现在已经通过。”^[3]他报道了为建造这艘船而进行的热闹的股票销售,因为当时人们以急迫的心情看待此事。恩格斯文中批评大船主不参与此事,认为此事可能半途而废。他再次言中了,这件一时轰动的事情没有结果。

恩格斯最后一次给《总汇报》投稿是在1841年1月底,标题是《威悉河泛滥》。当时德国许多地方发生了洪水,《总汇报》关于威悉河水泛滥的报道均为转载其他报刊的消息,恩格斯以不来梅通讯员的身份直接报道了1827年以来不来梅最大的一次洪水,自然被报纸看重而发表。恩格斯客观地描述了洪水造成的河坝冲垮、上游浮冰摧毁辅桥、船只因浮冰无法航行、邮政中断等事实,也报道了民间救援协会积极开展的工作。

五、恩格斯为科塔出版社报纸撰稿所体现的新闻传播思想

科塔出版社是当时德国新闻传播体系中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企业,但政治上很保守。青年恩格斯对其政治态度有所保留,以较为严格地遵循新闻规律的方式,充分利用其影响力,从而使自己的新闻作品和隐晦的政治观点得到广泛传播。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可以发现青年恩格斯远超其他同龄人(20岁前后)的诸多新闻传播思想。

(一)客观报道的思想初见端倪

德国是世界现代新闻业的滥觞,16世纪开始出现商业性的市民化报刊。虽然新闻“客观”的正式表达开始于20世纪初;但在19世纪上半叶,这一职业原则至少在德国已经成为一种新闻业惯例,因为作为生存条件,商业化报刊必须要赢得尽可能多的读者,不客观的报道必然失去意见相左的人群。例如恩格斯

自己就遇到这样一件事:1839年他的第一篇政论《伍珀河谷来信》(匿名)在《德意志电讯》发表后,巴门附近的小镇埃尔伯费尔德的《埃尔伯费尔德日报》编辑马丁·伦克尔发表文章指责匿名作者蓄意歪曲事实,不了解情况,人身攻击甚至撒谎。恩格斯托人把他的反驳信塞进他的住地,伦克尔竟一字不改地发表在自己主持的报纸上,并加了一段编著按语,写道:“昨天我们在住地发现了这篇文章,但不知投稿者是谁。现予以全文发表,因为我们愿意持不偏不倚的态度”。^[1]地方小报是这样,像《总汇报》这样的全国性报纸也是这样,它的工作原则是:保持表达上的臆想的平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研究者就该报的这一做法写道:“出版者和编辑对他们重视的通讯报道装出某种不偏不倚的样子。出版社的计划是保持表达上的臆想的平衡,遵循一种避免编辑部方面任何明确的政治表态的路线。”^[2]

恩格斯给德国文学派别“青年德意志”期刊《德意志电讯》撰稿,是因为自己的文学-政治观点与其接近,一旦道不同,没有了共同语言,便停止为它撰稿了。科塔出版社的几家报纸是面向社会发行的新闻类报纸,不是党派报纸,虽然政治保守,但在新闻报道(不是评论)方面还是比较规范的。恩格斯为它撰稿,自觉地遵循着不偏不倚的工作惯例。例如报道不来梅教会两派的争论,他两派都批评,以这种方式表达了他对两派同样的厌恶。他介绍不来梅报刊,也带有平衡报道的意图,因而能够展现这个城市报刊的全貌。甚至像《不来梅港纪行》这样的游记,描述船上和港口看到的人,下层人与上层人的文字比例都差不多。

当时并没有公认的客观报道的写作规范,报道中可以夹杂作者的观点表达,但恩格斯的报道通常习惯于平衡地再现与他反对的观点,给读者留下报道者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例如他关于不来梅剧院的两次报道和在《知识界午夜报》发表的关于德国青年文学家和其作品的评述。

(二)充分考虑读者对象的新闻事实选择

科塔出版社的三家报纸,其中《知识界午夜报》是面向全德各邦国大城市发行的文学性晚报,发行量不大,但必须意识到读者是全国而非不来梅一个城市的市民。所以,恩格斯选择这家报纸发表他对全德层面青年文学家及其作品的评述,该报也意识到他的文章对全国文学界的价值,连载9次发完这篇2万多字的长文。

《知识界晨报》是面向全德各邦国大城市发行量的市民报纸,有一定的发行量,以新闻为主。恩格斯在1839年1月曾为该报写过一首讽刺诗:

你早上读过了我,晚上必定想不起,
你看到的是无字的白纸还是印上字的报纸。^[5]

显然,这是一份消遣性的报纸。德国小市民对新闻的需求不同于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其情形就如恩格斯稍后(1842年3月)描述柏林市民时所说:“他们不也是只顾听听看看有什么新闻吗?你们随便到哪一家咖啡馆和糕点铺去,都能看到你们新雅典人都埋头在报纸里,而圣经却搁在家里,积满灰尘,无人翻阅。听听他们见面时的相互寒暄吧:‘有什么新闻吗?’‘没什么新闻吗?’如此而已。他们总是需要新闻,需要前所未有的消息。”^[4]恩格斯太了解德国市民的特点了,所以他为该报选择的报道主题均属于社会新闻,要把不来梅发生的事实,主要以新奇、探索、时效等因素来衡量,报告给不来梅以外的各邦大城市的市民。报纸为此开辟“不来梅通讯”专栏,则显示出不来梅对德国其他城市市民的分量。

《总汇报》是面向全德和欧美发行的综合性报纸,当时1万份的发行量仅次于《泰晤士报》,因而,从不来梅发出的新闻一定要在全德甚至欧美层面上考虑是否具有新闻价值。恩格斯投给该报的8篇报道,文字篇幅比给《知识界晨报》少得多,但产生的影响是全国和世界性的。对科塔的老板来说,不是恩格斯对他有多重要,而是不来梅这个世界性贸易港口发生的事实对德国和世界很重要,进而对报纸很重要,因而他才会亲自邀请恩格斯为报纸撰稿;而恩格斯则获得了一次展现其记者天赋的机会。

(三)敏锐的新闻价值意识

19世纪尚没有关于新闻价值的理论性论证,但在实际新闻实践中,新闻价值的意识已经形成。如果说为《知识界晨报》撰稿还要有一些娱乐、文化、知识方面的考虑的话,那么恩格斯为《总汇报》的撰稿,衡

量事实的标尺则是比较单一的新闻价值要素。第一组的两篇新闻报道《与关税同盟签订的通商条约》和《不来梅在同盟军队中的兵额》，都是不来梅可能对外产生重要影响的事实，它们不会成为一般市民聊天的话题；但前者对欧美、后者对全德都是重要新闻，因为不来梅自由市是德意志联邦一个独立的邦国，虽小但作为世界贸易的枢纽，地位重要。著名地点出新闻，这一现在所说的新闻价值的要素之一，那时恩格斯就已经掌握了。

恩格斯第三次为《总汇报》撰写的两篇报道《为法国军队运送马匹》《手工业者联合会》再次引发轰动，在于它们均与最新的政治事件相联系，是延伸政治事件的事实或需要及时加以分析的事实。恩格斯不在政治事件之中，但作为报纸通讯员，他及时提供了进一步验证事实的材料，或对可能的相关事实做出解惑的分析，所以恩格斯的这组文章又成功了。青年恩格斯对新闻的选择眼光很准，显现出敏锐的新闻职业意识。

英国蒸汽机动力的螺旋桨轮船试航以及这一新技术在德国与美国间航运中的应用，这样的话题一般市民的关注度有限，恩格斯之所以能够敏锐地抓住，在于他对19世纪世界交往趋势的宏观把握。新技术的运用会迅速带来较大社会变动，而变动恰恰是新闻的要素之一。司空见惯的事实不是新闻，事实发生了变动才有新闻。恩格斯的这组文章在德国被广泛转载，便是这一技术对德国航运业的冲击波所致。

（四）强烈的新闻时效意识

1840年的德国新闻业，早已认识到新闻时效的重要。由于交通和通讯条件的限制，新闻时效一般以月、旬作为衡量标准，所以那时的新闻关于新闻时间的交代大多均比较含糊。但对通讯员来说，必须以“天”作为时间单位，因为不来梅位于德国西北部沿海平原，而科塔出版社报纸的出版地在德国西南部的高原，而邮路是以马车为主要交通工具。如果在通讯员那儿不抢时间，报刊那儿更赶不上。

例如《知识界晨报》头版发表的恩格斯诗作《悼伊默曼之死》，就是他对这位德国著名诗人英年早逝的迅速反应。伊默曼1840年8月25日逝世，恩格斯8月31日开始写这首悼念诗。这样的文学创作速度当时算是快的了。12年后，原《新莱茵报》编辑、德国诗人费迪南·弗莱里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写了一首时事性的诗，恩格斯特别嘱咐发表它的刊物编辑：“除非必要，一分钟也不能多耽搁。……它们搁得越久，就越失掉现实性，因为甚至对那些为了永世长存而写的多数作品来说，发挥其最大影响和最强时效，也是有一定时限的。”^[9]因为他自己也写过这类诗，知道新闻时效的重要性。

分析一下恩格斯的写稿时间就可以发现，他的时间观念很强。他报道不来梅市与关税同盟签约(7月4日)后的进展情况，写于1840年7月24日；演员宰德尔曼到不来梅巡演是在9月6-15日，在不来梅附近发生的军事演习是9月12-20日，恩格斯写这两篇报道的时间为9月26日。1841年1月18日威悉河水开始猛涨，《总汇报》最早报道不来梅洪水的新闻(转载)是2月2日，而恩格斯关于不来梅洪水的新闻写于1月30日。30年后，恩格斯在曼彻斯特为伦敦出版的日报《派尔-麦尔新闻》连续撰写了59篇关于普法战争的新闻短评，他把稿子寄给马克思时的叮嘱是：“请你立即乘马车把这篇文章送到《派尔-麦尔新闻》，以便使它能在星期一晚上见报……丧失时机对这类文章来说是致命的。”^[10]

（五）交通革命带来的传播时空观

恩格斯在为科塔出版社报纸的撰稿中，写得最多的新闻是关于航海业的技术革命，如果算上《不来梅港之行》，共有5篇。除了新闻价值的考虑外，这也使然于他对19世纪欧美交通革命第一阶段(蒸汽用于交通动力)的深刻认识。

他在报道蒸汽轮船用于欧美交通的时候写道：“来往于德国和美洲大陆之间的蒸汽邮船一旦开通，这种新设备无疑会被迅速采用，并且会对两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用两周时间可以从德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到达纽约，从纽约出发用两周时间可以游览合众国的名胜，再用两周时间又可以返回家园，这已是指日可待了……自从康德把时间和空间范畴从思维着的精神的直观形式中独立出来，人类便力图在物质上也把自己从这些限制中解放出来。”^[11]显然，不到20岁的青年恩格斯已经熟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这本相当艰涩的哲学著作。该书第四章分析时空时，第一次为科学知

识确立了一个标准,即科学要有感性直观作为自己的对象,知识一定能够具有普遍客观实在的性质。进而说明,人的认识在本质上是能动的,但只有通过主体运用自己的直观形式,通过时间和空间进行主动的规范或整理才有可能。

10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谈到世界的航海业,写道:“老实说,自从有了这种全世界海洋航行的必要的时候起,地球才开始成为圆的。”^[7]再几年后,马克思进一步把交通革命的传播意义概括为“用时间消灭空间”。^[8]恩格斯晚年补充《资本论》第3卷时,把这幅图景描绘得更广阔,他说:“由于交往手段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9]这一重要的传播思想,起点就在1840年恩格斯关于德国-北美航线交通技术革命的报道中。

(六)语言与传播思想的最早呈现

青年恩格斯具有语言天赋,他在《知识界晨报》发表的《低地德语》一文,研究了语言的融合对人类传播的影响。这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历史上关于语言研究的最早文献,涉及语言融合过程中相互影响的诸多因素,从法律行文(不来梅律书)到文学故事(《列那狐》)的语言使用、不同词典对语言的规范等。他的论述说明,只要存在共同语言的人群,某种语言就会顽强地存在下去;而一旦外部更强大的语言随着大量人群的嵌入,生命力不强的语言消失是注定的,但会在侵入的语言中留下自己的遗迹。4年后,恩格斯在英国考察语言再次发现了同类的实例。苏格兰有一种山地居民的盖尔语,公路一通到那里,就出现了他描述情形:“虽然为保存盖尔语而开办了专门的学校,可是盖尔-赛尔特的习俗和语言一接触英格兰文明很快就消失了。”^[10]

24年后,恩格斯再次来到德国西北部,在丹麦与德国交界处发现,那里呈现着复杂的语言混杂局面。他告诉马克思:“语言和民族的关系是非常特殊的。在弗伦兹堡^①……港湾部分,是丹麦的,可是所有在港湾玩耍的儿童(数量很多)却说低地德意志方言……在宗迭维特^②,农民在小饭馆里交替使用丹麦语、低地德意志方言和高地德意志方言;可是在那里以及在宗德堡^③,我常常用丹麦语同别人谈话,对方却总是用德语来回答。”显然,他早期对语言融合的一般看法会有例外。当各种语言势均力敌的时候,语言的混杂会持续较长时间,语言既扩大交往又阻碍交往的“二律背反”可以奇迹般地成为统一体,鉴于长期生活其中,人们掌握多种语言成为本能,似乎对传播的影响不大了。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0-31;35-36;180;183;184;184-185;185;190-191;189;192-193;249;254;287;292;293-294;246;247-248;263;563;412;253.
- [2]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33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14-15;22;21;15-16.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94.
- [4] Corey Ross. Media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German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1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23.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32.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509.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3.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54.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

①弗伦兹堡(Flensburg),丹麦与德国交界处的德国小城。
②宗迭维特(Sundewitt),丹麦与德国交界处的丹麦小镇。
③宗德堡(Sonderburg),丹麦与德国交界处的丹麦小镇。

Young Engels' Press Activities and Ideas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The History of Engels' Editing Work for the German Publisher Verlag Klett-Cotta

Chen Lida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 In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practice of Marxist, the press activities of young Engels should be an indispensable beginning period which is full of practice and energetic thoughts. Based on the latest material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Engels has written for “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 and “Allgemeine Zeitung”, both of which are published by the Germany's largest publishing house—Verlag Klett-Cotta, around his age of 20, and sort out Engels' journalism professional ideas at that time. There are four findings as follows.

The first, Engels expressed his earliest time-spac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by a series of reports about steamers being used for European and American traffic. Through his coverage of the circulation of Plattdeutsch, Engels also expressed his earliest thought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language.

The second, Engels kept to the impartial rules in commercial journalism consciously. When Engels wrote for the literature periodical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he stopped his writing once there's no shared ideological concepts. It's the same when it comes to the commercial Verlag Klett-Cotta. Though authors' opinions were allowed to be expressed in the coverage, he got accustomed to impressing his readers with impartiality by representing opposing views evenly.

The third, Engels had a clear sense of news value. Obviously, he took entertainment, culture and knowledge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he wrote for the citizen newspaper “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 However, the factors of news value became the only standard to decide the facts since he wrote for the national newspaper “Allgemeine Zeitung”, as a result, almost every piece of his news had social impact.

The fourth, Engels held a strong concept of timeliness in news. Bremen, where Engels lived then,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ern plain of Germany, while the newspaper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Verlag Klett-Cotta located in the southwestern plateau. As Carriage was the main transportation between these two places, at that time, news timeliness was measured by a ten or fifteen-day unit, but Engels had already taken a single day as the unit.

Keywords: young Engels; Allgemeine Zeitung; 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 news values; news timeliness; time-spac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 收稿日期: 2017-12-11

■ 作者单位: 陈力丹,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北京 100097。

■ 责任编辑: 汪晓清